

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复兴神学家 爱德华兹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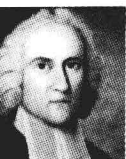
[美] 乔治·M·马斯登 (George M. Marsden) 著 董江阳 译 游冠辉 校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兴神学家
爱德华·华兹生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复兴神学家
爱德华兹

下

〔美〕乔治·马斯登 (George M. Marsden) 著 董江阳 译 游冠辉 校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录

(上)

导论	(1)
1 出生的年代	(13)
2 压倒性的问题	(32)
3 天路历程	(56)
4 一切知识的和谐	(72)
5 焦虑	(101)
6 “一种低落、消沉的状态与情形”	(122)
7 在所罗门·斯托达德的舞台上	(138)
8 在更广阔舞台上	(164)
9 上帝的以及撒旦的巨大工作	(186)
10 王国的政治	(210)
11 “一座建在山上的城”	(229)
12 上帝“将重新点燃那火光， 即使是最黑暗时期”	(248)
13 上帝之手与基督之手	(263)
14 “不与我们相合的，就是敌我们的”	(279)
15 “天国乐园”	(294)

(下)

16	保守的革命者	(311)
17	自相纷争	(330)
18	不再是一座典范之城	(358)
19	殖民地战争	(376)
20	“愿你的旨意成就”	(394)
21	“我生来就是不和之人”	(419)
22	严峻考验	(439)
23	传教	(462)
24	边境斗争	(485)
25	战争时期	(512)
26	反对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有害”教义	(533)
27	“在这个光明与自由之快乐时代 里的”原罪	(552)
28	挑战时代的预设	(566)
29	未完成的巨著	(581)
30	短暂的与持久的	(601)
附录 1	爱德华兹亲属谱系表	(620)
附录 2	爱德华兹的姊妹们	(623)
附录 3	爱德华兹的直系家庭成员， 来自他的家用圣经	(625)
资料来源注释		(627)
索引		(629)

保守的革命者

尽管爱德华兹在笔记、布道、出版物以及存留下来的两百多封书信里，留下了大量文字著述，但他却很少透露个人性的东西，除非是那些深具个人性的灵性与理智关切。我们对他日常生活与工作大多数细节的了解，主要来自塞缪尔·霍普金斯那深怀仰慕之情的传记式回忆录。从霍普金斯的描述来判断，爱德华兹非常属灵、勤勉、理智、内省，性格有些内向。他以最严格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他的生活。^[1]

与爱德华兹见面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霍普金斯承认，那些不太了解爱德华兹的人，会觉得他“生硬与孤僻”。但这位传记作者很快就补充道，“这是因为对他不够熟悉。”霍普金斯解释道，爱德华兹持守绝不说他人坏话的决心，所以他不参与那些常见闲谈中的打趣逗笑。爱德华兹亦遵循圣经中要“慢慢地说”（雅 1：19）的建议，所以他只有在有话要说时才会开口。爱德华兹还认为与陌生人陷入言辞争论是无益的，并觉得“自己当提笔在手时才拥有最大的优势”。而且，“他精力不是很旺盛，也没有多少富余的肺活量；而为了使他能各种人群中成为一个平易近人、诙谐有趣的绅士，这两点却是必需的。”

然而他的朋友们，霍普金斯坚持认为，却知道指控他“生硬与孤僻”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像他家人一样，了解他热烈与深情的一面。朋友们“总是发现他平易近人、亲切和屈尊俯就；虽然不甚健谈，

254 但却是和蔼和随意的”。他那受到信赖的同盟者，喜欢同他谈论严肃的灵性与理智问题。那些密友可以自由地质疑他的观点并与他进行辩论。对于他所关注的主题，霍普金斯说，“他的口才与笔头一样敏捷”；而他的密友也会发现他那些真诚的话语“是最动人和具有启发性的”。对于萨拉，霍普金斯报告说，“他与她的交谈及对她的举止体现出颇多的温柔与亲切。”^[2]

霍普金斯将爱德华兹刻画成一个热情的人，尽管他有时缄默起来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在公共场合十分拘于礼节，如果我们考虑到爱德华兹在觉醒运动中的成功的话，霍普金斯的刻画便是可信的。没有哪位牧师能像他在 1734 年至 1735 年那样，将如此大一个会众群体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在那时，以及在 1741 年至 1742 年的“续篇”中，城镇居民在他书房前排队寻求教牧辅导。至少在那期间，以及很明显，在他居住于北安普敦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人——不论贫富老幼——都发觉他是充满魅力和令人鼓舞的。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有点像一个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但几乎没有学者比他更强调情感的优先性。在他的布道里以及在真诚的个人相遇中，他人格的那种情感侧面就会不经意地显露出来。

理解对爱德华兹这一系列反应的关键，就是要认识到，他一心一意地奉献给了一项事业。就像许多这样的人一样，他寻求完全的忠诚。霍普金斯注意到，他会谨慎小心地挑选密友；并且在此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当与密友在一起时，他才会真正敞开心扉。毫不奇怪，他许多密友都是比他更为年轻的人，尽管他能够与任何忠诚于那项事业的人形成密切关系。他与和他具有同样关切的他的那大家族的成员保持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所罗门·斯托达德与威廉·威廉姆斯的时代。对于孩子们，他遵循着新英格兰的要打破他们任何任性迹象的惯例，并在他们很小时候就培养强烈的灵性生活。他几乎也是以同样方式来对待北安普敦人的：保持严格的纪律，要求真心的忠诚；而当他们表现出其他情形时，他就会感到不满意。他将他所寻求的忠诚，看作只是附带性地忠诚于他自己，因为那首先是对三一上帝的一种真心实意的忠诚；那意味着要弃绝所有纯属尘世的情感与效忠。

爱德华兹会呈现为什么样的人，主要依赖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分

享有他的异象。无同情心的陌生人会把他的沉默解释为冷漠，把他的教条立场解释为傲慢。随着新英格兰在觉醒问题上出现了分裂，那些不同于他的人，越来越多地将他看作一个顽固的派系拥护者。即使是在觉醒之外，他也因坚持下面这一点而名声在外，即圣职人员“在审查教牧事奉候选人时，应对其信仰原则以及宗教意向和道德，保持高度的批判性”。为此，霍普金斯说，“他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反对。”^[3]在反对者觉得这种谨慎显得冷漠和缺乏爱心的同时，站在爱德

255

德华兹一方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可敬的诚实。爱德华兹试图摧毁对手立场的那些论证，既可能被看作傲慢的诡辩，也可能被看作绝佳的阐明。他在布道论辩中的激情，既可能被看作无情的操控，也可能被看作热情、仁爱的灵性。他在谈话中矜持沉默的性格，既可以被看作不顾他人的冷淡，也可以被看作自我否定的约束。他一心一意委身他的工作，既可以被看作是缺乏社交性的自我中心，也可以被看作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侍奉上帝及邻人的无私奉献。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爱德华兹在尽可能地保持着严格的牧师角色；他将自己理解为，在秩序化权威统治的宇宙里，受到了一种崇高的召唤。他认为自己蒙召带领他的会众，肯定就像摩西蒙召带领以色列一样。他是这个城镇人的“父亲”，既是权威的也是仁爱的。像摩西一样（圣经将他描述为谦让的和言语和缓的）^[4]，他对他那些时常任意随性的人民怀有怜悯之心。他亦知道，就像摩西一样，他也具有弱点。然而他毫不怀疑，他被按立圣职要带领人们行走在上帝规定的道路上，而人们则必须要跟随作为上帝代言人与仆人的他。

奴隶制

我们可以在他那以等级制为前提的环境里，来考虑一下爱德华兹对待奴隶制的态度。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能将 18 世纪与 21 世纪的世界分割开来了。许多新英格兰精英都拥有非洲奴隶；而爱德华兹及其近亲，一般每个家庭也都拥有一两名奴隶。虽然留下的记录是不完整的，但我们知道，1731 年，爱德华兹曾旅行到罗得岛的纽波特；在

那里，他购买了一位名叫维纳斯（Venus）的年轻奴隶。到 1736 年，另一位非洲人——名叫利亚（Leah）——似乎已经取代了维纳斯（也许是爱德华兹夫妇给维纳斯起了一个更适合于这个教牧家庭的圣经名字）。1740 年，乔纳森与萨拉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以保证为“杰思罗·内格罗（Jethro Negro）及其妻子露丝（Ruth）”提供经济支持——他们是根据萨拉继母的遗愿而获得解放的。无论如何，爱德华兹夫妇自己似乎一直都拥有至少一名奴隶。^[5]

256 虽然在爱德华兹时代以前或期间，在欧洲裔美国人中存在着对非洲奴隶制的一些零星抗议，但最早在态度立场上的普遍革命，却是直到爱德华兹去世后的那几十年里才得以发生。在“美国革命”时期，许多美国精英，包括爱德华兹的追随者譬如塞缪尔·霍普金斯与小乔纳森·爱德华兹，都成为了奴隶制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在大多数英裔美国人直接将非洲奴隶制吸收进他们的社会等级制观念里以前，一般都认为，更高级的社会秩序需要有仆人来从事家务和农务劳动。白种仆人，大都签订了一定年限的契约，也会像奴隶那样被对待。他们完全依赖于主人的等级制权威。他们结婚、买卖财产或者离开居住地，都需要获得许可。他们可以被加以买卖、抓去偿还债务或者遗留给继承人。当然，其间极大的不同在于，非洲奴隶一般都是非自愿性的，而且通常都是永久性的。“奴隶拥有者”很清楚这些反常畸变情形，也很清楚非洲人在其奴隶状态下的悲惨状态。^[6]然而在革命时代以前，英国殖民者一般都将对非洲人的奴隶化合理化为对长期被接受的奴役与依附做法的一种延伸。^[7]

我们对爱德华兹观点的所有了解，均来自一份新近发现的片断资料。在 1741 年夏季或秋季的某个时候，正当“大觉醒”达到高峰时期，爱德华兹抽空匆匆写下了一份秘密论证清单，以回应就奴隶制所产生的一场争论。触发这些思考的那场争论是极其不同寻常的；大约在这一时期在新英格兰几乎没有任何已知的对等事件。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邻近迪尔菲尔德）教会的一些教区居民，谴责他们的牧师本杰明·杜利特尔（Benjamin Doolittle）拥有非洲奴隶。这种指控只是在杜利特尔与部分会众——在该城镇一些年长者的领导下——之间更大争论的一部分。那些“不满的弟兄”指责杜利特尔——他从

1716年起就是他们的牧师——提出了过高的薪俸要求；爱德华兹与其他许多牧师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些不满还出自这样一些怀疑：杜利特尔具有阿明尼乌倾向并对觉醒运动态度冷漠。不过，在此刻，就拥有奴隶所产生的争论，已经摆在了“汉普夏县协会”面前；而爱德华兹则被选定来起草一份回应。^[8]

爱德华兹认为对蓄奴的指控是不真诚的，并将他的主要任务看作是维护一位牧师同事的权威。他能这么做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或许也持有这一怀疑，即杜利特尔具有非正统信仰和“旧光”倾向。爱德华兹为其论证所写的便条不完整，也常常难以解释。不过有一点很明确：他相信那些持异议者提出奴隶制问题，“只是要在人们当中制造混乱和引发不安，以反对他们的牧师并对宗教造成巨大伤害。”

爱德华兹和他的蓄奴同事，以及他的“河谷诸神”朋友与亲属，257
在1741年必定格外渴望，蓄奴现状不要受到扰乱。在那个夏天，纽约城再次发生了许多人相信是想要焚毁该城市的一次重大奴隶阴谋。纽约人镇压所谓的恐怖分子的疯狂，在波士顿报纸上进行了广泛报道；对奴隶叛乱的恐惧已经扩展到了新英格兰。^[9]而使爱德华兹感到最为不安的，则是诺斯菲尔德指控的这样一个特征，即杜利特尔的指控者“吹嘘”，他们对奴隶制不道德性的论证“难住了”他们的牧师。尽管爱德华兹没有提及其含义，但如果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亦即，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位牧师在维护蓄奴问题上“无法说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那么这种言论将会激怒奴隶们。

尽管他的兴趣是要维护教牧权威和保护他的蓄奴者同类，但爱德华兹的论证却揭示了他对待非洲奴隶制所具有的深刻矛盾性。他的主要论证是，“不付报酬地利用邻人的工作”本身并不是有罪的，因为圣经明显允许奴隶制，而且圣经也不会自相矛盾。虽然上帝会暂时“默许”后来表明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一些古代做法（他可能想到了一夫多妻制），但奴隶制在新约里并没有受到谴责，而且“也不存在其他没有被明确提及并加以严厉禁止的普遍性的罪”。

在爱德华兹维护奴隶制本身并无过错的同时，他还特意谴责了非洲奴隶贸易。“其他国家，”爱德华兹追问道，“有权利或职责来剥夺所有非洲国家的权利吗？”尽管，奴隶制长期以来已被证明为是比在战争

中杀死战俘更加人道的选择，但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这一主张，即欧洲人声称，他们拥有把他们能抓住的任何非洲人变成奴隶的普遍权利。唯一看似有理的理由就是，基督教国家似乎有权利占有他们从非基督教国家所想要获得的东西；例如，就像以色列被告知他们可以从埃及人那里夺走财产那样。但爱德华兹指出，要把这样的先例解释为一种普遍原则是荒谬的。相反，所适用的原则只能是“所有人类都是邻人”，所以道德律适用于对待所有的国家。因而，欧洲国家没有权利从非洲人那里进行盗窃。^[10]

即便爱德华兹认为非洲与土著美洲文明大大低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那些异教徒还长期处在撒旦统治之下，但他认为他们在权利上和潜质上与基督教国家是平等的。在其于1739年就《救赎工作史》所做的布道里，他使北安普敦人确信，虽然这些人如今在某些方面几乎就像野兽一样生活着，当不会总是如此。在千禧年时代里，也就是数百年以后，他向会众断言，“可以指望，到那时有许多黑人和印第安人都会成为神学家；圣经将会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出版发行；不仅学问渊博的人，而且还有更为普通的人，都将深谙于宗教之道。”^[11]

爱德华兹明确否认，在上帝眼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任何内在的高低优劣。“我们出于同一人类种族”，他于18世纪30年代早期曾就《约伯记》31：15在一份笔记里如此写道——也许是在他最初成为蓄奴者后不久。“在这两者里，”他写道，“包含着反对主人虐待奴仆的最有力理由，亦即，他们两者都拥有同一位造物主，而他们的造物主也使他们拥有了同一种本性。”^[12]

出于同样理由，爱德华兹认为非洲人与印第安人在灵性上是平等的。在其事奉期间，北安普敦教会已经接受了九名非洲黑人为正式领受圣餐成员。其中有六位，包括爱德华兹家的奴隶利亚，是1734至1735年大觉醒的产物，并于1736年成为了正式成员。大约在这同一时期，教会还接受了两位印第安人成员：玛丽（Mary）与菲比·斯托克布里奇（Phoebe Stockbridge）。

忠实于其等级制本能，爱德华兹从这种福音派基督教平等主义的政治性破坏含义上撤退了。作为辩论中足智多谋的人，爱德华兹在有关杜利特案例的便笺里，利用非洲奴隶贸易的不道德性，表明了那

些不满牧师蓄奴的批评者所提出的论证，证明了过多的东西。爱德华兹指出，整个新英格兰经济，都依赖于非洲奴隶生产出的产品（在新英格兰贸易中，一个关键部分正是与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经济有关的）。假如直接参与到这个系统里是错误的，那么间接参与其中也可能是错误的，譬如购买由奴隶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如果反对者想要声明，间接获益于奴隶劳动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们最好能确定出具体步骤”，以使人们摆脱他们从中获益的奴隶制。通过这种“归谬法”，爱德华兹实际上是说，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免于从他人之邪恶中获益。因此，在千禧年的归信触及这个问题核心之前，人们应当只是尽量利用这种不完善的社会安排。^[13]

家长制权威

259

爱德华兹对待奴隶制的观点，就像他对待教牧角色的权威主义观点一样，属于本能就是一个社会保守派的观点。他将宇宙与世界看作是等级制的，并断定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应当是对上帝所设立权威的尊重。他在圣经里为这种悠久立场找到了充足的证实理由，因为圣经作者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等级制。而且，爱德华兹还是一个精英、男性、英国殖民地公民，并处在一个存在着强烈身份区别与尊重预期的时代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彻头彻尾 18 世纪的人——一个 18 世纪的传统派。按照美国政治与社会观点来看，他是革命前的。

看似矛盾的是，在他自己的时代里，没有什么比他极力推动的觉醒运动所具有的群众精神更具革命性的了。^[14]况且，爱德华兹的加尔文神学传承亦包括有革命性潜质，正如上一个世纪清教革命所表明的。他对未来种族平等性的观点也表明，归信派神学潜在地就具有一些平等含义。在爱德华兹的历史千禧年观里，他构思了基于觉醒运动与改革宗神学这二者基础之上的一场伟大的世界革命。不过，在他正确预见福音派新教的一场重大世界性扩展的同时，他却没有预料到它显著的群众性特征。相反，他相信，一场伟大的国际性改革宗革命，将会帮助建立起正当确立的权威，尤其是那些正确解释圣经的有学识圣

职人员的权威。

爱德华兹从保守的蒂莫西·爱德华兹那里继承来的社会观，反映了17世纪美国清教徒的这一理想，即建立由权威性大家长或族长领导的合乎圣经的共同体。爱德华兹所期待的是“改革宗—福音派”文化——这显然等于那些清教理想——的一种世界性胜利。他是一位改良派，因为他在帮助调整觉醒运动以适应于那一目的。然而那建构于新英格兰文明内的却是其他一些进步潜质——一种日益增长的个人索取性的现代文化以及一种更为大众性的权威，对此他实质上又感到了不安。

260 当爱德华兹于18世纪40年代在北安普敦面对各种挑战时，他的回应是以一种老式权威主义的父亲家长制为基础的；而后者正处在日益增加的张力之中。^[15]他的方针原则，他父亲会予以认可，在半个世纪前的新英格兰小村庄可能也行得通。事实上，持这种旧观念所导致的张力，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东温莎本地变得更为明显。在那里，由于对蒂莫西·爱德华兹处罚一对夫妇——他们在未经女方父亲同意下就结婚了——的努力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使得他在从1738年到1741年长达三年时间里停了他们的圣餐；在那里，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一个父亲与教牧权威的问题。^[16]在这些事情上，乔纳森坚决站在父亲一方。而在北安普敦，他继续为会众提供着一幅宏大的未来景象；但在18世纪40年代这个困难时期，他亦将发现越来越难以按照他的社会与灵性预期来影响这个城镇。

被印证了的觉醒

1742年3月，北安普敦处在奋兴热情的又一个高峰期。爱德华兹于2月份从巡回布道中返回后，他不仅遭遇到了萨拉的奇妙狂喜，而且还发现这个城镇在塞缪尔·比尔的布道下已经接近于失控。在接下来与比尔一道工作的几个星期里，爱德华兹同时既试图推动奋兴，又试图压制其过度之处。他写道，“我发现必须要用诸多警告和努力，才能使人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免于走向疯狂。”教区居民在狂热程

度上正在试图相互超越对方，并散布出了这样一种虚假印象，即情感越是强烈，热情表达越是激烈，真敬虔就越大。^[17]爱德华兹竭尽全力想要表明，正如他在整个觉醒运动期间所做的，极度激动对真灵性并非必需的——即便它们常常与真灵性是兼容并存的。

与此同时，当奋兴之火还在热烈燃烧之际，爱德华兹提出了一项计划以图巩固所获成果。从痛苦的经验中，他已经获知奋兴激情是短暂的。他不想再重复那在 30 年代后期所发生的事情。在那时，正如他后来承认的，他受到了一些肤浅热情的蒙骗，并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令人窘迫的地位：正当这个城镇在国际上作为灵性转变的典范而著称之际，它自身却在灵性上变得萎靡不振了。

这一次，爱德华兹试图将宗教奋兴那易于消散的极度愉悦感，转化为一种更稳定的灵性生活——能够通过固定的盟约渠道加以控制。在 3 月初，他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教会盟约，并把它提交给了会众中一些重要人物。随后又把它带到了在城镇几个区域成立的各种宗教协会。在获得认可后，他宣布一天为禁食祷告日，并在 174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正式接受这项盟约。在那一天，整个会众都聚集在礼拜堂里，在严肃庄重的仪式中，所有年满 14 岁的人都起立并认可了这份文献。

261

盟约更新仪式是以旧约为模式的；盟约自新英格兰创立以来就是它的一项重要支柱。根据改革宗神学，律法的用途之一，就是作为基督徒回应恩典生活的一种指导。所以，清教徒在传讲我们得救是因着完全不配的（unmerited）恩典的同时，还用一种仿效古代以色列做法的道德律（而不是仪式律）的律法体系来指导教会。在欢喜地为他们所得那不配的救恩感恩时，真正的信仰者很乐意立约采纳全面道德律作为他们的生活指南，即便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无法完全遵守它。

爱德华兹的长篇盟约，对一个典范城镇来说是一种引人瞩目的宪章。在承认上帝恩典和请求上帝宽恕他们早前的倒退之后，人们接受了一系列详细的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承诺。其中最大一部分涉及的是基督徒邻人应当如何共同生活。这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爱的典范”；它令人回想起了马萨诸塞第一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著名宣言，亦即应当如何用爱的纽带将这个基督教共同体联合在一起。由于爱德华兹的文件是一份正式盟约，所以他没有太

多论及那总括了这律法的爱原则（就像他在《爱及其果子》里所做的），而是详细解说了应用那种原则的具体规定。在这过程中，他还罗列出了时常陷入争吵的北安普敦人以往的那些失误，并使他们承诺要抛弃所有那些邪恶。

那些以任何方式欺骗邻舍的人，承诺不仅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之道，而且“在做出道德平等性规则所要求的那种赔偿或赎罪之前，我们就不会获得安宁”。同时，每个人都承诺要放弃背后诽谤、报复心态、仇恨、恶意以及秘密嫉妒。特别是在公共事务上，他们同意放弃那臭名昭著的党派精神，并“避免所有不符合基督教的抨击、谩骂、讥讽、品评与嘲弄他人，不论是在公开集会中，还是在私下交谈里”。

262 在一个较为简短但很快就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年轻人承诺，“我们将严格避免交友结伴中的一切随意与放肆，因为它们很容易挑逗或满足淫荡的欲望”，避免任何他们害怕参与其中的行为，如果他们知道在几小时后必须向圣洁的上帝交账的话。最后，所有人都承诺，“将我们全部生命都孜孜不倦地花在宗教事务上”，并“以恒久忍耐之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在承认这些誓言将来会与他们堕落倾向相对立的同时，他们“将时常按照这些承诺来严格省察自己，尤其是在领受圣餐之前”，并祈求恩典“来保守我们，免得这些庄重誓言受到邪恶的蒙蔽”。^[18]

在北安普敦盟约里所揭示的爱德华兹立场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他试图将奋兴精神制度化。在这方面，他不仅遵循着旧约盟约模式，而且还要求会众确认他们信守新约对基督徒生活所做的规定。然而，更大的实际问题，则是如何防止奋兴之光再次暗淡下去。就像使徒彼得在“耶稣显荣”的山上一样，爱德华兹正在提议建造一永久性的结构，以便能保存如此壮观的圣灵浇灌。

他亦在间接处理另一个令他越来越感到不安的问题。在他正在加入其中的国际与跨殖民地圈子里，有许多奋兴主义者强烈反对斯托达德式开放领受圣餐的做法。爱德华兹不同意那些声称他们能够可靠区分归信者与非归信者的观点，但他也体会到了他们观点的说服力，亦即教会应当审查要求成为正式领受圣餐成员的候选人，并确保他们在信仰与实践上表明了信守的可见迹象。怀特菲尔德钦佩所罗门·斯托

达德的福音派著述，但他惊讶地发现，斯托达德那开放领受圣餐的做法，甚至都会允许未归信的人做牧师。在怀特菲尔德与爱德华兹拜访乔纳森父母那一天（1740年10月21日），他们很可能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怀特菲尔德正是在这一天的日志里评论了斯托达德。^[19]蒂莫西·爱德华兹无疑对乔纳森在感情上有些影响，他曾在1732年发表的选举日布道里，公开批评了斯托达德式的在教会成员问题上的宽大仁慈，并含蓄地批评了他儿子对这一做法的继续认同。^[20]

如果实际上，教会里每个年龄达到成为领受圣餐成员年纪的人（显然是14岁），都表明了某些归信证据的话，那么乔纳森在这个话题上所体会到的不安就会得到缓解。爱德华兹似乎相信，这个城镇正在达到1734至1735年觉醒期间的那种普遍归信的水平，但是一些人随后的行为，使他确信事实并非如此。1742年冬季，觉醒，或者至少是对于宗教事务的兴趣，又一次不再是普遍性的了。即便他并不确定每个人都愿意提供归信证据，他还是劝说“所有年龄在14岁以上的人”²⁶³都对盟约进行郑重宣誓。而且，他还强调，特别是在领受圣餐以前，人们应当“按照这些承诺严格省察自我”。^[21]

荣耀日的黎明？

不论爱德华兹对1734年至1735年觉醒的长期影响产生过什么样的失望与幻灭，在1742年的冬季与春季，他对这场规模更大得多的觉醒的前景，仍持着极乐观的看法。他为之付出了全部时间与精力。他不仅经常外出旅行，而且当他回到家里时，教区居民也会排队等待他的教牧辅导。此外，他还奉献出了他大部分思想精力，来为奋兴运动撰写一部篇幅更长的辩护；这份辩护在次年春天成为了一部长达378页的论著，标题为《对新英格兰当前宗教奋兴的一些思考，以及它应当被认可与促进的方式》。^[22]

《一些思考》展示了面对觉醒运动处在令人振奋的高峰期时的爱德华兹。的确，当他于1742年撰写这部论著时，奋兴运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然而他坚持，这样一种潜在的革命值得所有基督徒付出全心

全意的支持。他在序言里间接提及了当下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冲突，亦即新英格兰也为其派遣出了一支远征军的“詹金斯耳朵的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但他更是宣布，“我们今天在新英格兰正在进行一场更加重要的战争。”^[23]正如任何战争里都存在许多混乱一样，《一些思考》意在成为一部甄别真理与谬误的详尽而全面的手册。它的实质性论证与《区别性标志》（*Distinguishing Marks*）是相同的。爱德华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无可辩驳地证明，觉醒实质上是上帝的一项伟大工作。与此同时，他也谴责了它的过度之处，并在真灵性生活当中，仔细区分出了那些超越圣经规范的做法与出神狂喜经验——后者对灵性生活来说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必然相排斥的。虽然他将这场争斗描述为一场战争，但他却将自己看作是一位居中调停者。他特别谴责了彼此双方的挑剔苛责。他不仅警告了那些由于觉醒运动的过度之处而谴责整个运动的人，而且还警告了那些太急于谴责教会许多成员与圣职人员为未归信者的觉醒者。

264 尽管他竭力想要开辟出这种审慎而明智的中间立场，并希望所有正直基督徒都能站在这个立场上，但他的论著还是因一句体现了他对新英格兰觉醒抱极大希望的不慎言辞而变得最为著名。为了试图确立“反对觉醒就是反对上帝伟大工作”这样一种更大的论点，他写道：“这不可能不是圣灵的工作；它是如此非凡和奇妙，是上帝那荣耀工作的黎明，或者至少是序曲；它在圣经里被时常预告；在它的进展与流布中，将会更新人类世界。”

而且，既然这些事件预示了末日的到来，最终预示了人们长久等待的千禧年，或者基督在世上的千年统治期的到来，他指出，“我们只能是合乎情理地认为，上帝那伟大工作的开端必定临近了。”假如爱德华兹没有紧接着补充道：“有许多事情使其成为可能，即这种工作将会始于美洲”^[24]，这样的预言也许不会是不同寻常的。

他接着用八页曲折繁复的论证来表明，为什么救赎史的模式，使得这种工作的黎明最先见之于美洲成为了可能。毫不奇怪，在其他方面会表示同情的艾萨克·瓦茨对此评论道，“我认为他有关美洲的推理缺乏说服力。”^[25]按照爱德华兹的看法，《以赛亚书》60章的预言（它开始于“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